

毛泽东宪政民主观探析

周 宁 宁

(湘潭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课部, 湖南 湘潭 411102)

【摘 要】 毛泽东宪政民主观以近现代中国现代性思潮为背景,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有关民主的论述,是毛泽东对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凝结和升华,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明确了民主的主体是人民,并对民主的物质保障与制度保障问题提出了构想和实践。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民主观; 民主主体;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3-0058-03

宪政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现代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并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本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一重要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定了基本内容。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民主观对党的建设与国家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民国时期对“德先生”的追求到当今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党外民主建设,并把它作为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可知宪政民主在国人心中与民富国强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因而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推进之际,回顾一下毛泽东的宪政民主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现代性思潮下的毛泽东宪政民主观

自鸦片战争以来,对现代性的追求也即现代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寻求富强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以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和价值为规范批判自己的社会和传统的过程。因此,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由社会契约论发展最终形成的宪政民主论的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都在西方,毛泽东的思想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中国百年思想的流变史。毛泽东宪政民主观也是服务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性蜕变,他希望对外通过有效地将社会组织到国家目标中,使落后的中国社会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来完成民族主义任务。毛泽东本人多次谈到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是将这

个革命理解为对19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并为这个现代化运动制定未来的方向。毛泽东的宪政民主观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宪政民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宪政民主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也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宪政民主理论。从政治后果方面来看,毛泽东用自己的宪政民主思想构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笼罩一切的庞大的现代国家体制,而且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组织到共产党的周围。毛泽东宪政民主观的形成及理解都离不开中国寻求现代性这个历史语境。因而毛泽东以悖论式的方式展开他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努力和社会实践,他的包含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的宪政民主思想,以及他种种与当下西方流行宪政思潮的背反实践,在中国寻求现代性这个历史语境下都可以得到新的理解。

二 毛泽东宪政民主观的主要内容

(一)宪政民主主体问题

从残酷的奴隶社会到禁锢的封建社会,奴隶主与封建主所建立的民主都是少数人的民主。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宣扬所谓的民主政治,但其形式上的民主是建立在经济的不平等之上的,因而只是富人的、大资本家的民主,而广大中产阶级和平民工人是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的,民主的实质内涵已被抽空了。“由于内部引起不必要的分裂,所以自由民主政治违背了它的初衷,本来民主是解放民众的工具,结果却成了征服民众的手段,并且其中个人主义的目标甚至会

【收稿日期】 2008-01-16

【作者简介】 周宁宁(1968-),女,湖南湘乡人,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副教授,湘潭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成为制造混乱的原动力。总之,代议制民主剥夺了普通民众积极参与政府管理的可能性。”^[1]而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民主的主体是占全国绝大部分人口的人民。因而在人类历史第一次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真正的民主。

毛泽东民主观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有关民主的论述,顺应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夺取政权是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第一步,争得民主又是实现无产阶级统治的重要保证。恩格斯也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3]将国家制度意义上的民主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的政治统治形式。列宁把民主和专政结合起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把对付资产阶级及少数居民的暴力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结合起来,而民主就是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的、真正普遍的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与解决有关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4]而苏维埃“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和最高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吸引他们参与政治,它是最靠近人民、最大限度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5]列宁把人民作为民主的主体,并将其十分强调的民主集中制作为苏维埃国家的党、政、军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为民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他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6]在毛泽东那里民主的主体——人民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这样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战胜敌人。

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阶级分析法,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和国情,从中得出了谁是革命的主体,谁是革命的敌人。他在1925年11月21日《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唯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实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7]毛泽东在1925年2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8]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欲灭亡中国,此时只有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才能把日本赶出中国。因此,这时期的民主主体又发生了变化,范围比以前更为广泛了,不仅包括了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了部分英美资产阶级。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民主

的联合政府”等宪政方案。这四个方案的基本宗旨是工农阶级联合地主阶级、富农、资产阶级等阶级敌人以反对民族敌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工农阶级与阶级敌人的“共和”是这四个宪政方案的基础,可称为联合专政。民主主体也空前广泛起来。“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分子”结成统一战线。^[9]毛泽东主张所谓革命阶级就是以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干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的联合体。^[10]概括地说,抗日民主政权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抗日分子的民主。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日趋成熟,民主主体内涵也日益丰富与深化。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949年毛泽东写作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提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1]并且对人民的概念做了界定:“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2]

(二)宪政民主的物质基础

确立了民主的主体,怎样保障人民真正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马克思说道:“自由王国是公众直接参与民主的必要前提”,并主张自由王国要求减少为获得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真正的自由王国尽管需要建立在生活必需品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但它一开始就能超越人的不平等地位,减少劳动的时间是达到自由王国的基本前提。”^[13]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民主所需的物质基础。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既是革命人数最多的主体,也是民主人数最多的阶级。而与农民息息相关的是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为民主打下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中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民权益、推动农民运动的具有立法性的重要规定,为推进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望,开辟了道路。1927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对农民宣言》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这个广大的贫农阶级之存在即为革命动力的要素。贫农问题不解决,革命将终究没有完成的一天。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14]同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总结了农民运动中的民主实践: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城市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式简直是疾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已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为农民争民主的同时也争地,二者是相结合进行的。在以后的苏维埃政权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土地立法。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该

政府主席,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大纲》,这些土地立法尽管还不够完善,并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干扰,但这些土地立法的实施彻底废除了红色区域内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度,确立了农民所拥有的对土地的基本权利,从而几千年以来的土地地主所有制被农民所有制所彻底取代了。

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毛泽东也积极探索民主实现过程中的物质保障。例如,抗日战争时期,选举权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民主权利,当时的政府以极大的努力确保了人民选举权的实现。在选举中,政府不但为选民提供交通便利,甚至还提供住宿饭食,使得选民能来到投票地点,顺利投票,对于不识字的选民,边区政府创造了画圈等投票方式,还设置流动票箱,从而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的顺利实现。在第一界参议会的选举中,边区 70% 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15]

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选举过程与途径上为选民做了充分的物质保障,从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民主、真实的民主,在此基础上也实现了平等民主,党员不与非党员争权。例如 1941 年 11 月 15 日陕甘宁边区参议院选举中,因共产党员占七名,略超过三分之一,徐特立当即退出,经大会通过党外人士递补。^[16] 这样,人民的民主在边区那里不但有保障而且是平等的。

(三)宪政民主的制度保障

有了民主,还需要一系列制度与原则去保障它的实施,只有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才能是真实的人民民主。毛泽东为此做了伟大的探索。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提出革命政权要实行“民主集中主义制度”^[17]“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18]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把国家权力的组织原则阐述为民主集中制,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就是民主制的含义。所谓集中指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只要政府的政策不违背经过民意通过的方针,就要确保其执行的顺利无阻。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时期,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19] 随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日趋成熟,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得到了发展。在《新民主主义》一文中,毛泽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政权形式。他说:“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20] 它是一种向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过渡形式,整体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这个政府执行民主集中制。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对民主集中制度做了系统的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众方针,选举政府,它是集中的,又是民主的,就是说只有这个制度才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会有了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处理被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民主活动。”^[21] 因此民主集中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主制度被确定下来了。

民主集中制是毛泽东在探索民主的过程中,把马列主义

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以及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革命与抗战的不同时期,对于推动全国民主建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建国后作为一项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保留了下来,并在宪法里加以确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三 结论

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近现代以来先进中国人最核心的课题。从早期郑观应等人对西方思想的传播到康梁变法维新,从孙中山三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课题来服务的。放在整个世界思想发展史语境中就成了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宪政民主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是作为实现强国富民的手段传入我国的。毛泽东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注入其中,使之成了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追求现代性的工具,他的宪政民主观也因此而具有其独特魅力。毛泽东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宪政民主主体是人民的思想,又改造了人民的概念。在革命实践中极力推动土地改革为我国宪政民主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形成了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国民主建设的制度保障的思想,他的这些宪政民主思想为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开辟了新道路。当然,毛泽东宪政民主思想主要形成于革命年代,属于“革命”的宪政民主,这种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近百年来对现代性的追求有了坚实的基础。但中国共产党执政已有半个多世纪,中国共产党面临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深刻变革,革命的宪政民主观也需转变为执政的现代宪政民主观。因此,我们既要坚持和继承毛泽东宪政民主观的科学内核,又要结合当下社会主义实践大胆创新,大力推进我国宪政民主建设,早日建成现代化国家。

[参考文献]

- [1] [13][美]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希瑟·高特勒,麦克尔·哈特. 控诉帝国[M]. 肖维青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42. 243-244.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93.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74.
- [4] 列宁全集: 第 2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111.
- [5] 列宁全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58.
- [6] [8][10][19]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31-732. 677. 674-675. 383.
- [7] 毛泽东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8-19.
- [9]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60.
- [11] [12][18][20]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80. 1475. 89. 675.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88.

(下转第 106 页)

[参考文献]

- [1] 肖龙福. 拆解文化围墙的“指挥棒”——浅析外语教学大纲中的文化教学目的[J]. 外语教学, 2002, (2): 81.
- [2] House, J. English as lingua franca: a threat to multilingualism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Blackwell, 2003, (4): 556 – 578.
- [3] 蒋 莉. 关于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度的调查[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 [4] 彭聃龄. 普通心理学(修订版)[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5] 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M].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31 – 38.
- [6] 王艳萍. 大学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地区对比研究[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7] Fantini, A. E. A Central Concern: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P]. Blackwell. Adapted in part from a “Report by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ask Force,” World Learning, Brattleboro, VT, USA, 1994. Alvino E. Fantini, Brattleboro, VT, USA 1995; Revised 2000.
- [8] Kim, Y. Y. 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 – cultural Adaptation [J].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Non – English – major Students in Different Contexts

WANG Yan – p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Byram’s ICC mode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193 non – English – major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wo districts of different intercultural contexts with the research instrument of a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demonstrate that: First, the current ICC levels of the non – English majors in these two contexts are quite low; Second, the status of four dimensions in ICC is of imbalance; Third, on the whole, the contex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ay exert little influence on their ICC development.

Key words: non – English major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context; dimension; influence

(上接第 60 页)

- [15] 宋金寿.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5. 117 – 118.
- [16] 王永祥. 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255.
- [17]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2.
- [21]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57.

Mao Zedong’s Concept of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ZHOU Ning – ning

(The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College of XiangTan, XiangTan 411102,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originated mainly from the exposition of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on democracy with Modern thought of Modern China as the background. It is the condens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Mao Zedong’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rich in content. It clearly defines the main body of democracy is the people proposes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material and system guarantee of democracy.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the main body of democracy; modernity